

【名家背影】

□黄万华

想说说黎锦扬已经好多年了。三十年前讲五四时期的乡土写实派,就知道湖南乡土作家黎锦明兄弟是湘潭著名的“黎氏八骏”。大哥黎锦熙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毛泽东的国文老师,四哥黎锦纾留学法国时与邓小平是同宿舍好友;后来得知八人中最小的黎锦扬是最早将中国文化带进百老汇的旅美作家,他其实也是山大校友,但我在山大多年,却未曾听人提及此事。

黎锦扬 8 岁时就被大哥带到北京求学,在大哥家来来往去的有钱玄同、齐白石、毛泽东等。1936 年,他得知老舍等在青岛执教,便慕名考入山大(青岛),日后他还谈及老舍、洪深等教他读书的事。可惜抗战爆发,学业中断。他后来毕业于西南联大,1945 年赴美国留学,再度与老舍相遇,自此开始了他的异域生涯。

1947 年,黎锦扬在耶鲁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却因为一时无业面临被遣送回国。为了生计,他到唐人街打工,并以唐人街为题材开始创作。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以为是移民局打来的,便主动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送我回中国吧。”未料喜从天降,《作家文摘》通知他,他的短篇小说《禁币》获奖,奖金 750 美元;同时又有一家杂志转载了这篇小说,他又得了 750 美元转载费。一篇 3 页的小说,解决了他一年多的生活费问题,而更大的收获是他以此申请到了永久居留权。

唐人街生活促使黎锦扬创作了长篇小說《花鼓歌》,以华人父子王威扬、王大的故事写代际、族群的文化冲突。1956 年小说完成,却无出



黎锦扬与妻子、女儿在一起

版机会,最后送到一家知识性书籍出版社撞运气。出版社请了一位 80 岁高龄的书评家审稿,当时老人病危,看完书稿已无力气写审稿意见,只写了“Read it”(可读)两个字就过世了。而正是这两个字,使得《花鼓歌》于 1957 年得以出版,当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而此前中国作家的作品,只有林语堂的散文集有过此殊荣。

《花鼓歌》很快引起美国文艺界广泛关注,洽谈舞台剧、电影等改编权的人纷纷前来。经纪人经过筛选,提供两项选择让黎锦扬最后决定,一个是百老汇制作人三千美元的首演权,另一个是好莱坞制片人以五万美元买断《花鼓歌》的所有版权。三千比

五万,相差巨大,而五万美元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偏偏那天晚上黎锦扬在做决定时自己喝醉睡着了,翌日一早,经纪人兴冲冲地打电话来,祝贺黎锦扬选择对了,原来,黎锦扬在醉意中决定接受百老汇,而事后他自己浑然不知。后来,黎锦扬才知道,那三千美元只是百老汇首场演出酬金,以后每场演出都有版税可拿。《花鼓歌》改编成音乐剧后,在纽约和伦敦两地就上演了 1000 多场,得到六项东尼奖提名,又由环球影城拍成电影,造成轰动。2002 年,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推出新版音乐剧《花鼓歌》,在洛杉矶上演再次备受好评,小说《花鼓歌》也再度重版,其经典地位被确认。

黎锦扬的这三次“运气”似乎有其偶然性,但却有着他持久的追求。黎锦扬 1941 年大学毕业后,就到云南芒市土司衙门当英文秘书,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到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难免冒险,他却在那里度过了他认为最美好的三年,他和“摆夷”人友好相处,又积极协助土司开展现代化改革。黎锦扬似乎天生能与“异族”友好相处,又真诚关注他们的命运。他出版过十多部小说集,包括同样列入《纽约

时报》畅销书榜的长篇小说《情人角》等,但他自认讲述云南土司故事的长篇《天之一角》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其中写到的中国远征军和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冲突反映出他敏锐的文化感受力。赴美后,黎锦扬也无水土不服,更没有陷入乡愁而不可自拔。他是中国作家中最早扎根美国的生活,和美国妻子组成的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谐美满,社交圈也融入了美国社会,但他的创作却全部取材于中国历史和华人生活。《赛金花》、《上帝的第二子(洪秀全)》等长篇着眼于人性、爱情写中国历史人物,《金山姑娘》、《堂门》等长篇开掘华工早年在美国采金、筑路的艰辛历史,《中国外史》更是以一个家庭四代人的命运,讲述从晚清到“文革”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其中的文化冲突和沟通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他不会将文化冲突政治化,而是用文学形式去展现,让读者、观众自己去体悟思考。

一直到新世纪,九十多岁高龄的黎锦扬还创作了《新疆来客》、《来自中国的女人》、《中国女人的灵与肉》、《旗袍姑娘》等多个剧作,在好莱坞等地上演,无一例外地写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冲突,他理解美国文化,尊重美国文化的娱乐性,视创作为职业,认真精心地建立起作品人物与读者、观众的关系,并采用美国人喜欢的幽默、轻松的方式表达,由此也让美国人认识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华族与人为善、相忍为谋的文化气度。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怀念刘方元

朴而又有点保守的校风里,总觉得不搭调。对于外界的这个说法,刘方元心里其实门儿清,他是性格使然或者说故意为之。放到现在,大家可能就见怪不怪了;放到美国,那就是行为艺术家了。所以,我对刘方元有一个新的认识:他是个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的实质就是要解构,破坏现有的秩序和规范,以刘方元的方式,就是用不正经来消解你的一本正经。这么说,赵老师可能不高兴,会批评我丧失立场:“他惹了多少麻烦,为帮他真是操尽了心。”这话也是,学校的正常管理总是要依据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能迁就那些旁门左道,但那时如果能够多一些宽容心,对刘方元这样的另类人物能网开一面,我们现在内心里或许就会多出一份平静,或许就会少了一些遗憾。

刘方元在班里的确是个麻烦制造者,他总是动不动挑出一些事来,喜欢在同学之间传话、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对班干部和美女尤其关注,不是拿话调侃开涮,就是故意引火上身,在言语博弈中寻求快感。幸亏同学们觉悟高,均能识破他的小伎俩,没有互相掐起来。

然而,刘方元在骨子里又并不完全是这些东西,内心有时很传统,很敏感,很脆弱。大学第一年,我和刘方元、石进明住在同一个大宿舍。一次,就我们三人在宿舍,不知为何,石进明的一句话触动了刘方元的伤心处,引得他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我和石进明在一边怎么劝都劝不住。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刘方元的心里苦着呢,一定有一种抹不去的孤独感。

后来我明白,刘方元的后现代综合征,病根就是弗洛伊德说的那个“力比多”压抑,也就

是性压抑。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对爱情的渴望和憧憬。他有勇气对任何人胡言乱语,用嬉皮士的方式来挑起女生的反感 and 注意,但唯独不敢对自己心仪的女孩表白心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刘方元最初的梦中情人是我们一班的孔丽,他总觉得孔丽那种病态的忧郁的气质和他自己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他期待在同病相怜中升华出一种爱情。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鼓励刘方元走出这一步,这段从未有过开始的爱情在他的自卑和我的俗见中夭折。孔丽后来也非常不幸,在学校时一直郁郁寡欢,毕业后疾病缠身,终告不治。有时我也在想,如果他们两个真的在一起的话,是否都会好些呢?

刘方元本性善良,他开的玩笑、演的恶作剧均无恶意,更没有进攻性,唯独那次和 79 级男生打架,他揣着一把菜刀上门要去劈人家,吓得那几个原来挺横的学弟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由此他背上了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校纪处分。这次打架的根本原因,刘方元后来向我交代,是因为他看上了 79 级的一个女生,为引起人家的关注,不惜在打架事件中刻意扩大事态,制造轰动效应。在公布处分的那次会议上,刘方元特意跑到办公楼上,从高处观察那个女生听到处分他之后的反应,当他看到她在其他学生的一片欢呼声中毫无兴奋的表现时,深感欣慰。从这个事情中,你可以知道,刘方元被爱情的渴望已经折磨得他失去了正常的理智。

生活的困境、心理的困境,均来自于爱情需求的不能正常实现,一旦爱情来临,这些困境便能迎刃而解。大学最后半年,

同学们都惊奇于刘方元变了,简直如同换了一个人,早上起来,也像张安仁同学那样把胡子刮得一千二净,原来油脂麻花的衣服换成了新的制服,邋里邋遢的形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文学青年。这些变化均是因为艺术系的 M 姑娘主动向刘方元伸出了爱情的橄榄枝。刘方元告诉我,M 姑娘爱上他来源于他所做的一件极其微小的好事。一次在食堂排队买菜,M 姑娘在刘方元前面,钱没带够,就差一毛钱,正手足无措时,刘方元及时地递给她一毛钱,把她从这个极小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正是从这个事情开始,M 姑娘由感激而生爱慕,主动牵上了刘方元的手。喜剧刚开始,接踵而至的就是悲剧了。毕业分配,刘方元分回潍坊,M 姑娘回青岛。导致他们两个分手的原因,不全是分居两地,其间他们有过剧烈的性格冲突。刘方元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爱情,为挽留她,他使尽各种手段,哭泣、哀求、下跪,甚至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但这些都已无法阻挡 M 姑娘离去的步伐。同学家明后来曾对我说,那年夏天,刘方元来青岛找他,由他陪着去见 M 姑娘,那时刘方元看上去人已经走样,没有魂了。他的希望像海边的风一样,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离世的念头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心里。

死,有时也是一种解脱。这个事过去已经有 30 年了,每当我想起它,内心依旧有一份痛。现实世界给予不幸的人,是太少的关爱和温暖,我只能写下这些文字,告诉九泉之下的刘方元,我还记得他。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78 级学生)

1970 年,山东大学文科与曲阜师范学院(现曲阜师范大学)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大学,设学曲阜。

合校虽然是 40 多年前的事,但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那就是购买英语工具书。

众所周知,现在的“新华书店”里古今中外的书籍琳琅满目,各类图书应有尽有。然而,在与山大合校时那个极“左”的“文革”时代,书店里摆放的几乎全是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其他政治性书籍,文艺书籍十分罕见,中外名著更是无处可觅,因为它们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在被“横扫”之列。而作为我们学外语的人来说,要想买一本原版的外文工具书,那更是“难于上青天”,因为它们被看作是“封、资、修”的极品。

1972 年 1 月 25 日,为了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张健先生托人从

【历史尘烟】

“文革”购书记

□曹务堂

济南外文书店为英语教研室的每位年轻教师买了一本《A GRAMMER OF ENGLISH WORDS》(英语单词语法)。这是一本我国影印(现在称“盗版”)的英国朗曼公司的工具书。现在看来,让读者啼笑皆非的倒不是该书的内容,而是该书封二粘贴的那张纸条。笔者认为,对于研究“文革史”的学者来说,它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其史料价值远远超过该书的学术价值。我想,现在的年轻人怕是对“文革”知之甚少,更难知什么样的语言是“文革语言”。故此,我将该纸条的内容全文抄录如下,以便让年轻人开阔眼界,品尝一下“文革语言”的独特风味:

最高指示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关于开放发行外语工具书的说明

本书系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出版。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工农兵群众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对于这类外语工具书中的一些不符合无产阶级观点的例句提出了意见。为此,当时决定:外语工具书暂停发行。

自从各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以后,特别目前各地正在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热潮的时候,各地读者和书店都要求迅速解决外语工具书的发行问题。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洋为中用”但又“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等一系列教导,我们认为,已经印出的外语工具书品种和数量较多,其中不符合无产阶级观点的例句肯定不少,删不胜删,广大工农兵读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有很高的批判力,在使用中他们可以批判吸收。为此,我们呈请上级批示后决定:现存的外语工具书,可凭工作证、学生证发行。

由于本书没有经过政治审查,其中难免有封、资、修的毒素,希望读者提高警惕,批判吸收!

北京市第 608 邮政信箱

1970 年 1 月

“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当时均称“最高指示”,而且必须用黑体字印刷,以示其重要性。当时的各类报纸亦然。“文革”初期,只要晚上七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一条新的“最高指示”,各大专院校必定是敲锣打鼓、上街游行,以示庆祝。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最高指示不过夜”。

必须提及的是,40 多年来,笔者在教学和科研中经常参考这本工具书,但令我困惑的是,我至今也没有发现哪些是属于“不符合无产阶级观点的例句”。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